

《大陆、香港、台湾学者论中国经济发展》序

董辅初

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展望并非易事，因为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特别是常常有一些人为的干扰使经济偏离正常的运转轨道。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运转中政府的干预相当强，政府采取的政策对经济运转的影响大大超过许多国家的这种影响。正确的干预会使经济的运转大大加速，错误的干预则相反。例如，1984年下半年作出的放松银根的决定对其后经济过程、通货膨胀以至实行治理整顿都有明显的影响。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不可能作出展望和预测，因为它总是有轨迹可循的，只是在作出这种展望和预测时，对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和干扰应有足够的考虑。这种不确定因素的干扰自然不仅来自中国的内部，还有外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幻。

从1991年起中国经济已进入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按照以往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在本世纪末，与1980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将增加三倍，使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由于前十年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因而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递增约9.5%，九十年代的十年每年只需递增5~6%即可实现使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增长3倍的目的。按照中国经济以往的发展经验以及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的状况，每年增长5~6%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至于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指标则有较大弹性和不确定性。提出小康水平是针对温饱水平和富裕水平而言的，这就是说，人民对基本生活资料的需要（即所谓温饱）应该不仅得到满足而且消费水平比这

有所超过，但还谈不上富裕。由于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一些贫困地区做了大量的脱贫工作，除了小部分人还没有过上温饱生活以外，总的说来，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所以，实现人民生活的小康水平的目标也不应有问题，只是超越温饱水平多少的问题。

我想，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展望的角度看，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发展需要考虑的问题，主要不是能否使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递增5~6%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否超过对基本生活资料的满足。从中国以往几十年的经验来看，问题在于经济的发展极不平稳，速度的起伏很大，每次大的起伏都导致大量的损失（例如，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的开工、停工、延长工期导致的大量损失）；在于产业结构经常失衡，一些瓶颈产业（能源、原材料、交通、通讯、农业等）的制约造成生产能力的大量损失（例如，许多企业由于能源和原材料供给不足而开工不足）；在于企业管理不善，效率低下造成大量的损失（例如能源、原材料的损耗大，人浮于事和劳动纪律松弛造成的工时损失，设备长期不更新造成的损失）。由此造成人民的生活并不能在经济的发展中得到大致同步的改善，再加上人口增长迅速，使得人民生活提高滞缓。这不仅影响在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递增5~6%甚至更多的情况下，人民的小康水平实际能达到多高（或人民的生活水平能超过基本生活资料的满足到什么程度），而且关系到十年以后，即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能否有强

足的后劲。由此出发，在展望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中，有一系列问题值得研究和解决。这里仅就其中的几个问题谈谈。

(一) 人口与就业问题。人口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项严重制约。七十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口控制成绩显著，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2.6%下降到1983年的1.2%，但近几年来有所回升。八十年代中期，一些人口学家曾预测，2000年中国大陆人口为12.04亿人，12.48亿人和12.80亿人三个方案（1990年相应为10.99亿人、11.19亿人和11.36亿人），人们曾认为中间的方案实现的可能性较大。但据最近人口普查的资料，1990年7月1日中国大陆人口已达11.3368亿人，也就是说已经接近最高的预测方案（1990年底则将略有超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已由1982年的14.55%上升到14.70%。如果没有适当的措施，到2000年人口就将达到13亿人左右了，即超过最高的预测方案，这不仅会严重影响实际能达到的小康水平（即超过满足基本生活资料以上的水平），而且由于过快增长的人口将吸纳众多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中取得的资源，使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将背上沉重的人口包袱，难以迈开大步。

由于人口增长快，并比预计的要快，就业的压力加大了。今后十年每年所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在1500万人以上，如果再加上目前农村中已经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和城镇未能就业的人口以及企事业中大量的冗员，需要安置的劳动力数量相当庞大，事实上，不可能用新增加的就业岗位将他们全部吸纳。这样，即使不考虑增加的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由于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和企事业中的冗员无法全部被转移出去，这也将严重妨碍农业、工业和其他部门的劳动效率提高，妨碍新技术的运用，妨碍管理的合理化，从而妨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拿农业来说，谁都看到，当前每个农户承包的土地面积太

小，规模不经济，无法推广农业机械化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如果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被转移到非农业，农业的规模经济就不可能达成。

有鉴于此，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势在必行。除了政府的资源和国内的资源以外，广泛动员各方的资源包括引入国外资源增加就业人数也势在必行。

(二) 资源问题。中国号称资源大国，但实际上，除劳动力资源以外，如果按人平均计算，许多资源都少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地区分布极不平衡。就是劳动力资源也存在素质低，专业人才短缺的问题。中国按人平均的耕地大约只有2亩，比世界平均5.5亩少得多。由于人口增加，住宅和其他各项建设占地大量增加，耕地每年大量减少，为数约在700~800万亩。到本世纪末，按人平均的耕地可能降到只有1.5亩。其他资源的情况各不相同，但资源的短缺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例如，水资源的短缺正在威胁北方许多地区的饮用水和工业用水的必要供给，中国按人平均的淡水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的1/4。不少矿产资源的蕴藏是丰富的，但尚待开发，资金、技术和交通甚至水的短缺，限制了它们的开发。

如果只着眼于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受自然资源的制约并不大（除土地资源和能源的制约以外），如果着眼于更远的未来，其制约将会越来越显著。如果不加紧开发和合理运用，自然资源的短缺就会成为妨碍经济发展的突出因素。在自然资源的利用方面，中国存在着两面短缺，一面浪费的现象。拿能源来说，中国的能源利用率只有30%。美国1970年已达51%，日本1975年已达44%，中国单位产值的所耗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也高一倍左右。其他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低也是普遍情况。如果不实行节约利用，多次利用，综合利用，短缺局面很难转换。例如即使我国的能源今后每年平均增长3.5%，

到本世纪末，能源也将短缺2~3亿吨标准煤。但是，浪费严重反过来也说明节约的潜力巨大。

资金的短缺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为实现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增长三倍的目标，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小康，解决大量劳动力的就业，所需要资金数量，估计达3~4万亿元，甚至4~5万亿元。这样多的资金从哪里来？目前中国的财政收入每年不过3千多亿元，即使全部用于经济发展也远远不够。解决的主要途径只有三个：一是国内多途径融资：中央融资、地方融资、企业融资、居民融资。这方面是有潜力的，单就居民来说，不计已存入银行的储蓄，手中持有现金就有2~3千亿元。二是从国际融资，十年来已经开辟了这条途径，问题是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以吸引更多的外资。三是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益，克服大量的浪费，仅就缩短基本建设项目的建设工期而能节约的资金来说为数就很可观。

（三）产业结构问题。从中国经济的发展来看，在产业结构方面要突出解放两个问题：

第一，解决现行产业结构的失衡问题。农业、能源、原材料、运输、通讯以及其他基础产业的落后，与加工工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不相适应和滞后，长能以来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近两年对国民经济实行“治理整顿”，其中一个内容就是要解决产业结构的这种失衡，这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有了起色，但总的来看，进展不大。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当中国经济在走出低谷重新加快发展以后，缓一段时间，由于这些“瓶颈”的约束，中国经济又得被迫再次调整。从而又一次出现马鞍形的起伏，造成新的损失。解决产业结构的这些失衡难度很大，要求有大量投入、推行新技术、克服许多经济体制上的障碍。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农业发展的滞后问题。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按人口平均的耕地面积在不断减少，农产品需求的矛盾不易缓解，即使以1990年来讲，农业大丰收，创历史记录，但人口平均计算食粮产量只有750斤或稍多一点，比1984年的793斤少了大约40斤。农业与人口竞争的结局不能盲目乐观。近来要求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的呼声高度高涨，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第二，适应于伴随新的技术革命而发生的世界性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造，主动地调整和改造中国的产业结构。这不仅对于九十年代，而且特别是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战略性的意义。目前，中国还不得不动地接受发达国家把战后已视为“夕阳工业”或失去比较利益的工业向中国大陆的转移。这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很明显。香港地区大量劳动密集的低技术的企业（例如成衣业、玩具业）内迁到这一带。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短期来说有利，可扩大就业，增加出口，获取外汇，增加财政收入和人民收入等等。但从长远看，中国还需要主动地把握新的技术革命展现的前景和提供的机遇，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造，发展有前途的新兴产业，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否则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后面，拾其“余唾”。自然，在目前还不能放弃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调整和改造产业结构过程中出现的机遇，这种机遇中国不抓住，其他发展中国家就抓去了，中国目前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四）技术改造问题。除了经济体制和管理方向的问题以外，中国经济的落后在于技术的落后，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要靠技术改造、技术的革新和革命。上面所讲的问题要得到解决，大多离不开技术改造。

中国的科学技术，据一般估计大约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达20年至30年，有些可能落后更多，可能超过30年。到本世纪末，要使

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增长3倍，除了要靠投入以外，还得靠技术改造。如果到本世纪末，中国的科技水平能相当于八十年代初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将迈出一大步。在近期内，重点应是对现有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特别运用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加以改造。除了近来兴建的并采用了先进的技术的企业以外，其他企业大多技术陈旧。近期内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的重点应是开发和推广节约能源和原材料的技术、开发和推广提高产品质量、发展新产品以及用于出口创汇的产品和国际化产品的技术。在更长远的时期内则应注重发展现代的高科技产业，例如微电子工业、计算机及软件产业、新型材料工业、光纤工业、生物技术产业、航天产业等等。

为了实现技术改造的艰巨任务，在一段时间内将以引进国际的技术为主。引进中更多的应是适用技术、发展了的传统技术，自然也应有—批先进的甚至尖端的技术，同时也要加强自身对技术的开发，注意对引进技术的消化，模拟、吸收和创新。

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技术改造取得了不小进展，但存在的问题很多。主要是引进的技术不少。但消化、模拟、吸收的不多，在引进的技术基础上开发创新的技术更少。这样，不仅要重复引进，而且为了追随别人的更新技术，为使差距不再进一步扩大，就不得不不断引进，由此耗费的资源也很多。其次是中国自己研究开发的新技术难以广泛运用于生产，也即科研与生产的脱节。再次是现有企业缺乏技术改造的能力和动力。缺乏能力，不仅是企业缺乏科研人员，而且缺乏改造的资金，这不仅是由于国家在技术改造方面的投资不足、银行在技术改造方面的贷款不足，而且首先在于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太低，企业无力积聚必要的资金用以更新设备。而提高折旧率又会遇到将减少本已拮据的国家财政收入的障碍。缺乏动力，在于企

业还没有彻底割断与政府母体相连的脐带，缺乏竞争的市场和压力。近来实行的承包制使得承包者容易追求短期的利益，缺少长远的打算。企业宁愿扩大生产规模，而不愿在技术改造上下功夫。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能否取得长足的进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技术改造、技术革新，取决于对技术改造的障碍的排除。

(五) 提高经济效益问题。这是中国经济中的一个很困难的问题。造成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是众多的，有技术方面的原因，有人的素质方面的原因，有管理方面的原因，以及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往往各种原因相互牵扯，只就哪方面解决都归于无效。例如，技术设备落后往往是企业经济效益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进行技术改造，更新设备，但在引进了先进的技术，更新了设备以后，如果使用这些技术设备者素质低，不会操作掌握，或者管理落后，这些技术设备也难以发挥效率，甚至占用了资金，增加了利息的负担，经济效益并不能提高。前些年，不少企业购置了大批电子计算机，实际上大多未得到充分利用，有不少甚至躺在那里，无人问津了。在中国，往往同样技术设备的企业，经济效益的差距极为悬殊，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效益的差距也极为悬殊。这意味着提高经济效益的潜力很大。可以毫不夸地张说：中国经济的发展的状况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民的生活能有多大提高，小康水平实际能达到怎样的水平，将取决经济效益能否提高，能提高到怎样的程度。

(六) 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面讲的种种问题。除了人口问题以外，都与经济体制有关。其实人口问题中也有与经济体制有关的问题（如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人口城市化问题）。它们的解决都离不开经济体制的改革。拿自然资源中的土地资源来说，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就与经济体制有密切关系。在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的，集体

所有究竟归谁所有？法权关系是模糊的，不少土地被一些干部和农民用于建住房，建乡镇企业。在城市，土地是国有的，土地没有价格，实际上是单位所有，哪个单位占有了土地，就可以无偿地使用土地，甚至可以用多余的土地与别的单位“合作”建住宅，无偿地分得一半左右的住房。再拿技术引进来说，重复引进的发生也与经济体制有关。彩色胶卷生产线引进多条，一则是因为有的属化工系统，有的属轻工系统；二则是这个厂是这个地区的，那个厂是那个地区的。而国内新开发的技术之所以难以应用于生产也有经济体制问题，例如技术市场没有发展，技术难以商品化，就是经济体制问题。前面谈到的，由于“大锅饭”还在吃，企业与政府间还连着一一条脐带，企业缺乏技术改造的动力，这些也是经济体制问题。

原有的经济体制妨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改革，不如此，中国的经济难以步入现代化的行列，这已是大家的共识。

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将取决经济体制如何改革以及改革的实效。这个题目很大，不是这里所能展开谈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不会平坦，为改革甚至得付出一些代价。但改革正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希望所在。

《大陆、香港、台湾学者论中国经济发展》一书即将出版，作者嘱我作序。我在这篇序中草略议谈了一些问题，远非深入研究、深思熟虑的结果，只是提出若干想法。读者自然应该去读本书而非我的序。我相信，本书有助于海内外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士更好地了解中国经济的未来。

注释：

《大陆、香港、台湾学者论中国经济发展》一书，即将由湖南出版社作为《中国经济大趋势丛书》第一部出版。武汉大学经济学院的国世平、杨再平等参加了本书的主编和撰写工作。

(责任编辑 徐云鹏)

(上接第73页)

的道理。各地农村基层组织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开展一些具体的服务工作。诸如帮助独生子女家庭致富；帮助做绝育手术的夫妇及家庭解决具体困难，协助其料理家务，术后随访；开展妇女、儿童的保健服务，提高其健康水平等等。

6. 配合其它经济政策，采用利益诱导机制，抑制农民的生育动机。农民的生育行为容易受到短期利益的驱动，在现实经济利益条件下，要完全扭转这一局面是不切实际的，但因势利导，在政策制定、实施等方面将经济利益与计划生育有机结合起来，如在责任田划分、农用物资供应、乡镇企业招工、农转非等方面优先安排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农户，对超怀、超生的农户取消各种优惠待遇，使农民有权衡利害的标准，自觉消除多育的愿望。

计划生育工作单靠哪一种管理方式是无法深入开展、取得预期成果的，还必需有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关心，共同努力，以使我们伟大的祖国真正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幸福！

注释：

①刘兆云：《对农村15—19岁人口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效果的调查与思考》，《人口学刊》，1990年第1期。

(责任编辑 徐云鹏)